

韩愈诗文选译

本书责编：黄云生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 (50种) 130.00元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陕西扶风法门寺安放佛骨的唐制纯金四门塔



韩愈画像

南京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程。

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材，使之打下坚实基

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

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韩愈这位唐代的大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在身后多年交好运，到近半个世纪之前才开始倒起霉来。交好运主要是靠他在古文上的成就，宋以来要学做古文的人谁不用他的谥号尊称他一声“韩文公”？起码也得用他的郡望称他一声“韩昌黎”。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几乎成为有学问人的必读书，历朝刻印过不知多少次。尤其是明代后期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流行以后，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古文家的姓名在知识界真可说是家喻户晓。记得当年考初中时的投考指南就有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位的考题，害得我死记硬背了大半天。其实，当时这八大家的地位已经在低落了，因为在此以前已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给迷恋文言文者扣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帽子，“选学”是指骈体文的权威读本

《昭明文选》，和韩愈没有干系，“桐城”则是清代做古文的一个派别叫桐城派，而这个桐城派恰恰把唐宋八家当作自己的祖师爷，“桐城”既成谬种、居祖师爷首位的韩愈岂得继续风光下去，这是韩愈第一次倒霉。第二次，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霉倒得更大了。起因是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唯物主义，这本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应该的，我直到现在还是这么看，而且还继续去宣传，即使被诟为“顽固保守”也不悔。但当时有些过左的同志却并不这样看，他们硬要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这就不好办了，韩愈的言行哪能符合马克思主义呢？连所谓朴素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好名列八家第二位，也是韩愈的好朋友柳宗元的文章里被他们发现到真有点朴素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之柳宗元曾经参加过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而韩愈偏偏不愿参加还对王叔文等人颇为不满，于是一种“扬柳抑韩”的论调就应运而生。万不得已要讲到韩愈的古文时，也得先批判然后略作肯定，大有“一批二用”“批字当头”的意味。到“四人帮”闹什么“评法批儒”时柳宗元就更红火地被列入“法家”光荣榜，而韩愈成为了臭不可闻的“儒家”卫道士。

我现在选译这本韩愈诗文，当然不会同意上面这些极左的论调，而是想真正运用点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篇前言里把韩愈这个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的真面目告诉给读者。

韩愈不参加甚至反对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不是一项特大罪名吗？所以这里先从王叔文这次政治活动说起。

这次政治活动有些教科书称之为“永贞革新”，但这个名称实在不太通^①，所以这里仍称之为王叔文等人或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据说，王叔文集团是代表庶族地主的新兴力量，他们的政治活动就是和代表士族地主的旧势力作斗争。但就我所知，士族地主到唐代已不成其为特殊的政治势力，因为他们已不像南北朝的士族那样有庇荫宗族佃客的特权，即使是南北朝士族的后裔，要做官也只能和普通人一样得通过科举考试。我又查过王叔文集团和他们对立面的家世，对立面中出身庶族的反略多于士族，而王叔文集团里出身士族的竟在三分之二以上，庶族则连王叔文本人在内还不到三分之一，像柳宗元本人就出身于北朝以来的老士族。这实际上

^①王叔文集团是顺宗在位时掌权的，顺宗在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即位，到八月四日就被迫禅位于皇太子宪宗，自己退为太上皇，五日才以太上皇名义改元为永贞，接着王叔文集团就彻底垮台，就算是“革新”吧，也只能说是“贞元二十一年革新”或“顺宗革新”，“王叔文革新”，不能说是“永贞革新”。

不是什么庶族和士族之争，而只是统治阶级上层各个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在唐代经常表现为在皇帝周围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另外想夺取这利益的集团则拥戴皇太子或其他皇子、皇孙，一旦时机成熟就连皇帝取而代之，使本集团来掌权。王叔文集团的兴衰史就完全遵循了这个规律，他们早在德宗后期就依附于皇太子顺宗形成政治集团，德宗死去顺宗即位后，这个集团就和顺宗的亲信大宦官李忠言内外勾结而掌大权，但德宗时期的当权派不甘心丢权，勾结了另一个大宦官俱文珍拥戴顺宗的皇太子来夺权。夺权成功，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包括宦官李忠言和主子顺宗自然都得被收拾。这种权力之争具有较大的冒险性和强烈的排他性，绝大多数不想冒险或不愿意在排他上过于勾心斗角的官僚士大夫对此是不感兴趣的。韩愈不过是这绝大多数中的一员，他对王叔文集团一不参加，二还加以指责，但在他们失败后并没有落井下石，对其中柳宗元等人的文章政治还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彰。这么做不能说有什么过错，难道必须参加王叔文集团与之同归于尽才算合格吗？

至于王叔文等人上台后的政治措施，除掉为争夺权力的一些行动外，韩愈并没有作过批评指责，因为在这方面他们之间包括和其他政治人物之间并

没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而且在行动上韩愈做得并不比他们逊色。不信，可以把韩愈的全部历史摆上来让大家审查。

韩愈在有的史书上说是昌黎人，其实这只是韩氏的郡望。韩愈这一支在好几代前就住在河阳，而且除祖父韩叡素在唐代做边远地区从五品上阶的州长史外，曾祖韩仁泰、父亲韩仲卿都只是下级官员，即使本来是士族也早已没落。加之韩愈三岁就失去父母，跟随谪居韶州的大哥韩会和大嫂生活，德宗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时凭自己的本领举进士科及第。这和柳宗元年轻时走的道路并没有区别。

以后韩愈三次考博学宏词科没中选，在贞元十二年（796）二十九岁时应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邀请以秘书省正九品上阶的校书郎名义去任观察推官，十五年（799）董晋去世，他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邀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阶的协律郎名义任节度推官。这种去地方长官幕府任职是当时文人未显达前常有的事情。而且他在徐州时对张建封的沉溺打球荒于政事能上书劝谏，并非一味阿顺长官混日子。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和张建封意见不合辞职回到京师，十七年（801）他三十四岁时被任命为国子监从七品上阶的四门博士。十九年（803）三十

六岁时改任御史台正八品上阶的监察御史，品阶虽比四门博士低，倒开始有了点实权。但因为天早上状请求停征京兆府管内百姓的两税钱，得罪了府尹李实，再加上其他原因，如上书议论“宫市”的流弊之类，当年冬天就被贬去连州阳山任县令。这罢宫市和减免赋税都是王叔文等人在顺宗朝所干的有益于百姓之事，可韩愈早在德宗时就要求这么干了，而且自己还因此栽了跟斗，这种政治表现比王叔文等人包括柳宗元在内并不差什么。

贞元二十一年（805）顺宗即位，大赦，韩愈内移江陵府任正七品下阶的法曹参军事。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三十九岁时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监正五品上阶的国子博士，这才算开始挤进高级官员的队伍。第二年又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去洛阳。元和四年（809）改任刑部从六品上阶的都官员外郎仍旧分司东都。元和五年（810）改任正五品上阶的河南县令，在任上为惩治不法军人敢上启和东都留守郑余庆争辩讲道理。元和六年（811）调回京师任兵部从六品上阶的职方员外郎。元和七年（812）因帮一个县令讲话出了问题又调任国子博士。元和八年（813）改以刑部从五品上阶的比部郎中名义任史馆修撰，专职纂修国史；九年（814）改以吏部从五品上阶的考功郎中名义任史馆修撰，又改任知制造即为

皇帝草拟诏令。在这时期韩愈纂修成《顺宗实录》，王叔文等人勾结宦官李忠言专擅朝政固然写了进去，对他们所干有益百姓的好事也都一一如实直书而未抹杀。

元和十一年（816）韩愈四十九岁时凭资历升任中书省正五品上阶的中书舍人。但又因主张讨伐割据淮西地区对抗中央的吴元济而和宰相发生矛盾，被改任为皇太子东宫里毫无实权的正四品下阶的右庶子。幸好宪宗也下决心要讨伐吴元济，在元和十二年（817）任命另一位同样主张讨伐的宰相裴度为淮西地区的彰义军节度使兼淮西宣慰处置使，充任讨伐淮西的统帅，裴度奏请韩愈做他的行军司马。八月出师，十月就生俘吴元济平定淮西。年底回朝，韩愈因功被升任正四品下阶的刑部侍郎。请注意，王叔文等人主张制裁藩镇曾被教科书说成是“永贞革新”的主要措施，可韩愈不仅同样主张而且见之于行动。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五十二岁时又干了一件十分出色的事情，这年正月宪宗把所谓佛骨迎进京城并请入皇宫，这本和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毫不相干，可韩愈偏偏上了个著名的《论佛骨表》，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愚昧举动。这下子弄火了宪宗，把韩愈贬到岭南的潮州去做刺史，冬天才内

移到袁州做刺史。在袁州刺史任上他设法解放奴隶，和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做法也完全相同。

元和十五年（820）初宪宗去世，穆宗即位。到秋天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的长官从三品的国子祭酒。第二年长庆元年（821）春天回京师任职，到七月又被任为有实权的正四品下阶兵部侍郎。这时河北地区的成德军发生兵变，王廷凑杀节度使自立，长庆二年（822）朝廷妥协，派韩愈去宣慰，韩愈不怕危险完成了任务。回京后迁任吏部侍郎，虽仍是正四品下阶，可已位居尚书省六部长官的前列。长庆三年（823）改任从三品的京兆尹兼正三品的御史台御史大夫，因和实际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御史中丞发生矛盾，又改任兵部侍郎，再重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韩愈在京师因病去世，按旧的算法享年五十七岁。

多年来我们不是说：“不光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吗？从韩愈这一生的行为来说，除早年为谋求出路作自我奋斗外，在掌握权力哪怕是很小的权力时也能体现出他的正直和敢作敢为，能够尽可能地为国家为百姓办好事而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这对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更难能可贵的，韩愈这么做还不是单凭一点正义感或所谓“良心”，而是有他创立的政治理论作为基础，